

專題論文

專題：族群關係與客家認同

導言：族群關係與客家認同

王甫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本期專題為「族群關係與客家認同」，特別收錄了 3 位臺灣客家研究的新生代研究者的論文。作為本期專題的客座編輯，本人想藉此機會稍微說明一下在此時推出這個主題背後的理念與構想，以及本期的 3 篇主題論文。

臺灣的客家學術研究在 1990 年代以後，因為 1988 年客家族群文化運動興起之刺激，而開始浮現。2000 年以後，更因為首度政黨輪替後中央政府在行政院成立「客家事務委員會」（後更名為「客家委員會」），以及隨後陸續成立的客家電視臺、客家學院、客家研究中心的體制化發展，而進入起飛的階段。臺灣客家學術研究發展脈絡，和中國最初的客家研究出現狀況，有相當的相似性。客家研究的開山宗師羅香林教授在其 1933 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導論》一書中，便提到「客家問題哄動學界」的三個時期：1808~1904（第一時期，由洪秀全、楊秀清太平天國起義算起）、1905~1919（第二期，由廣東順德人黃節在《廣東鄉土歷史》中提出「客家非漢種」之說算起）、1920~1930（第三時期，由西人在《世界地理》中認為客家是「居於山地野蠻部落的退化人民」算起），每一時期的起因都與「土客械鬥」後，廣東人對於「客家」（與「福老〔佬〕」）「非漢族」的貶抑之說有關（羅香林 1933：2-9）。羅氏的這本著作則是在 1930 年開始的第四時期（廣東省建設廳的《建設週報》刊登客家「語言啁啾、不甚開化」之說算起）中，為彌補先前研究之不足而完成（同前引：10-24）。同樣的，1990 年代臺灣客家學

術研究出現，則與當時客家文化運動為了抗議國民黨政府的語言與文化政策與民進黨的「福佬沙文主義」而浮現有關。如果說「客家研究」大量出現是「客家意識」或「客家認同」高漲的重要表徵，那麼，這兩個不同時空與社會脈絡下，極為類似的客家研究出現背景，說明了「族群關係」（特別是與其他「族群」的衝突性互動關係）對於「族群意識」或「族群認同」興起或普遍化的重要影響。

上述關於族群意識或族群研究出現的社會脈絡的基本觀察，也對於族群意識或族群研究的內容有重要的暗示或影響。具有同樣祖源或共享語言文化的人群，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下，與不同文化群體的互動或衝突，需要區分的文化群體不同，將會對其群體意識、或「族群」意識的「內容」有影響。1930年代中國廣東的客家人衝突的對象是「廣府人」、1980年代臺灣客家人衝突的對象主要是「福佬人」（以及優勢掌握國家機器的「外省人」）、移居海外各國的「客家人」衝突的對象更是因時因地而異，有的以移居地的本地人、有的以同為華人的其他祖籍移民群體為競爭對象；在上述諸多狀況下，不僅客家認同的內涵與強度有差異，有些狀況下「客家」身份意識甚至被「華人」身份意識所掩蓋（特別在海外，如同本期姜貞吟論文所研究的大溪地法屬玻里尼西亞客家人之處境與認同）。

除了上述這兩項比較一般理論性因素外，「族群關係」與客家認同的關連，還有臺灣社會發展的特殊性因素。這主要是指1980年代末期臺灣的社會脈絡下，客家人被定位為臺灣的一個重要「族群」（「四大族群」之一）的特殊狀況、原因、與其影響。臺灣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開始引用的西方學者在1970年代發展來理解早先十年西方各國層出不窮的族群復甦現象（ethnic resurgence）的「族群關係」之分析概念與理論（特別是 Glaser and Moynihan 1975; Bennett 1975），

來理解原先在臺灣被視為是「地域意識」現象的省籍、原漢、及閩客關係與問題。這些試圖解釋「族群認同」與「族群意識」何以在現代社會持續存在，以及其特殊面貌的族群關係研究，強調族群研究取向已經由過去將研究重點聚焦於「文化、人口、團體」的「族群團體」(ethnic groups) 課題，逐漸轉變為「認知、行為、策略」的族群性 (ethnicity) 研究問題 (Bennett 1975 : 4)。這些族群關係研究通常以「民族國家」(nation-state) 的單位做為社會體系範圍，討論的是社會體系內部 (通常也就是民族國家界線內) 文化群體之間宰制與支配關係建立、維持及其變遷 (王甫昌 2008)。1990 年代以後出現的第一波臺灣客家學術研究，由「族群關係」的角度來分析當時離開原鄉、進入都會地區的客家人，為了改變 (下一代) 語言流失、被迫選擇「隱形化」、及文化、記憶受打壓等等問題，而發起客家族群文化運動進行抗爭，正是其中重要的研究主題與成果 (例如：徐正光 1991；徐正光、蕭新煌 1995)。

然而，臺灣客家學術研究最初的「族群化」(也就是將客家人視為一個「族群」的問題意識)，以及客家文化運動在崛起後很快就成功地獲得政府以建立中央層級的族群事務機構回應，卻也影響了 2000 年以後客家研究進入學術建制後的發展方向，也引發了一些新研究議題。第一類新研究課題，與臺灣客家研究的「族群化」及後續對此一概念化的**反省與回應**有關。在臺灣客家人被當成一個族群看待以後，其內部語言文化的地域性差異，或是在不同地區內與不同「族群」互動的經驗，對其「客家族群認同」內涵有何影響，成為許多研究者關切的新課題。也因此，移居都市、留在原鄉、北部桃竹苗、南部六堆、花東客家聚落、島內二次移民等「客家族群」內部的地域、次方言、族群接觸經驗的差異，成為族群關係的問題意識下，新的「族群內部」或「族群之間」的研究焦點。除了最初進入的社會學與政治學之外，不同學門 (特別是歷

史學、人類學、語言學、大眾傳播學)研究者之投入,更對此一新的發展有重要的貢獻。

第二類新的研究課題,則和**臺灣客家文化運動成功的獲致政治回應**,「**客家意識**」進入體制化的發展後衍生的新現象有關。中央政府的「客家委員會」及幾所大學「客家學院」、客家研究中心的陸續成立,使得臺灣客家「族群化」有了新的體制性基礎。客家作為一個「族群」的名詞用法與相關分析概念,不僅在臺灣社會中首先被確立,也隨著臺灣政府族群事務專責機構的建立與政務推動、以及客家學院學術跨國交流的推展,逐漸向海外(包括客家原鄉的中國)擴散,甚至漸漸取代了其他社會中原先習慣使用的概念與稱呼(民系、客屬、方言群、祖籍群、族裔等等)。這也引發了兩種新的研究問題。一是對於海外「客家人」(由祖籍原居地、或客語使用界定出來者)是否有「客家」認同、或是其發生的原因與機制的探討。早在羅香林(1933)的著作中或是1960年代外省客家人在苗栗所創辦的《中原》雜誌,以及1970年代受前二者啟發的陳運棟(1978)關於「客家人」的溯源、遷移、語言與文化特徵的研究中,就相當強調客家移民在中國原鄉之外,海外各地的分布與優異表現。但是,在1990年代臺灣客家研究的「族群(關係)化」的影響下,以及客家政務及學術交流的影響下,現在有關海外客家人與當地人、或是當地其他「非客家」華人移民的「族群」互動關係,對於是否產生「客家認同」、或是其維續的社會與文化機制,成為新的研究課題。在全球化浪潮的衝擊、跨國移民的普遍化的新社會情境下,「離散認同」(diasporic identity)的分析概念與理論典範,成為這新一類研究課題中用來與過去強調「民族國家」界線內「族群關係」的研究與觀點對話的基礎之一。

另一類與上述客家事務進入政治體制化發展有關的新研究課題,

則是在脫離「運動論述」挑戰體制、而成為體制內例行政務推動的「體制化」過程中，「客家認同」的內涵轉變與發展。當過去客家族群運動論述「由下而上」要求政府重視、介入及保障其語言與文化權益的訴求，成功地獲致政府回應，而透過政府客家事務專責機構開始「由上而下」地推動語言與文化的紀錄、保護、甚至是建構新的族群象徵時，「客家認同」將受到何種影響？最初由進入都會地區的客家人所發動的運動抗爭，在體制化之後，對於原本較沒有客家族群意識的臺灣傳統客家聚落將發生何種影響？「去抗爭性」的客家認同將有何種新的風貌？這些都是近十年來臺灣客家研究出現的新課題。

本期專題所收錄的3篇論文，正好恰恰反映了這些新的臺灣客家研究發展趨勢。

洪馨蘭與徐孝晴關於「屏東頭分埔北客的聚落化過程及其能動性」的研究，說明了島內二次移民的狀況下，在日治時期由新竹州（今桃園苗地區）南遷的北客，戰後以來在屏東頭分埔地區建立其外於當地六堆客家社區之外的聚落之過程。在今天「族群化」概念下被當成是與六堆客同為「客家族群」的這群北客，透過民間信仰系統儀式的融合採借、與華山萬福宮的共同興建，長期維繫了與當地福佬（閩南）人較為密切的互動關係（合作又競爭），以及有別於當地六堆客的「頭分埔北客文化」。這些透過傳統的社區文化與社會機制所建構起來的地方性認同，說明了其先行行動者的能動性，但是也在現代化社會發展的力量下，因為年輕一代不再參與讓原先「北客意識」得以保存的社會與文化機制，而面臨未來發展方向不確定的問題。

姜貞吟「法屬玻里尼西亞客家族群邊界與認同在地化」一文，則展現了客家研究在臺灣族群化、及客家事務建制化的發展之後，對於海外「客家人」族群認同與邊界變化的影響。本文雖然是以遷移到大溪地的

客家人在當地的適應與在地化發展的歷程為主要的分析課題，但是「臺灣客家運動」與「客家族群研究」對於「大溪地客家」在 1990 年代以後認同上的刺激或影響，卻也明顯地出在本文的論證中。大溪地的客家人在重要身份認同上，由 1850 年代以來，經歷了幾個重要的轉變。1990 年代以前，主要的影響因素幾乎都是與當地人、其他華人移民群體（主要是廣東移民與後裔）的互動，以及法國的移民或國籍政策有關。然而之後的變化，除了全球化流動的影響之外，也受到中國的發展與臺灣客家的發展相當大的影響。大溪地客家人在其法國的國族認同之外，擺盪於「華人」與「客家」之間的族群認同以及文化上的「多元揉雜性」正說明了這些新的影響。

柯朝欽的論文「臺灣客家現代族群想像的三種類型：民族認同、公民權利、及認知框架」則是直接討論具有現代性的族群概念，在目前臺灣社會中具有的多重面貌。這篇論文一方面試圖釐清本人過去在「族群關係」分析架構下所提出的「當代臺灣客家族群想像」的主要內涵是以「公民權利」為主要面向（王甫昌 2003），另一方面則是提出「民族認同」及「認知框架」兩個額外的面向，來補充及闡述目前客家族群想像的不同面貌。引用 Anthony D. Smith 的「民族認同」是作者用來演繹其所稱的客家族群想像在要求「公民權利」的面向之外的「文化 - 象徵」面向，將臺灣客家族群想像出現的背景中，與「中國認同」和「臺灣認同」的民族認同之消長更迭做了比較直接的連結。而 Roger Brubaker「認知框架」，則是作者用來強調「制度化與實踐認知」，也就是本文前面提到 2000 年代客家事務進入體制後，脫離「運動論述」的新階段中新浮現的族群想像面向。

這三篇由人類學及社會學研究的新生代研究者，以不同門學所擅長的研究取徑，對於「族群關係與客家認同」在當代浮現新研究議題的成

果，除了讓我們看到立基於過去研究基礎上的新課題的開展，也看到不同學門投入客家研究，對客家研究學術建制化所引導出的可能性與潛力。

參考文獻

- 王甫昌，2003，《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出版社。
- 徐正光編，1991，《徘徊於族群與現實之間：客家社會與文化》。臺北：正中書局。
- 徐正光、蕭新煌，1995，〈客家族群的「語言問題」：臺北地區的調查分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10：1-40。
- 陳運棟，1978，《客家人》。臺北：聯亞出版社。
- 羅香林，1933，《客家研究導論》。廣東：興寧希山書藏。
- Bennett, John W. ed., 1975, *The New Ethnicity: Perspectives from Ethnology*, St. Paul: West Publishing Co.
- Glazer, Nathan and Daniel P. Moynihan eds., 1975,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